

## · 古籍保护 ·

## 《广装潢志》的四部稿本

陈 腾

**内容摘要:**中国古籍与书画的修复装潢由来已久,然而这门技艺的发展演变,长期缺乏总结。上海图书馆藏有《广装潢志》“稿本”“副本”“新定本”各一部,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佚名”所编《广装潢志》誉清稿。比勘文本与字迹数过,确定四部稿本的作者皆为民国收藏家宣哲,并厘清其先后顺序。《广装潢志》全书体例严明,囊括了海量的修复装潢方面的史料,为古籍保护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从学术史的脉络回溯,宣书接续了明中叶文人论述书画装潢技艺与清中叶经生考证书册制度的传统,同时参照了民国时期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间附按语。其中《巧工》篇一章当为潘景郑《历代装潢工人考略》的直接来源。

**关键词:**《广装潢志》 宣哲 古籍保护 潘景郑 稿本

古籍保护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许多学者围绕其学术定位与学科建设展开热烈讨论,这项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sup>①</sup>。但是古籍保护自身的发展史,却很少有人做过专门的回顾与总结<sup>②</sup>。根本原因在于史料分散,搜求不易。明代周嘉胄《装潢志》与清代周二学《赏延素心录》都过于简略,两书

<sup>①</sup>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是姚伯岳、周余姣:《任重道远 砥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探索与愿景》,《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4期,第44-60页。另外《图书馆论坛》开设过“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专栏,诸文亦可参考(张靖、刘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背景、现状及空间》,《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4期,第101-106页;周旖、赵心、刘菡、张靖:《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核心议题述评》,《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4期,第107-114页;刘菡、牛迎卜、周旖:《国内外古籍保护研究议题及其比较》,《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4期,第115-123页)。

<sup>②</sup>学界已有概述性、专题性的研究,详参李致忠:《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第80-86页;林明:《中国古代文献保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家驹:《中国古代藏书管理》,花木兰文化出版社,(转下页)

相叠,所得不过八千馀字。即便今人矢志编撰一部《中国古籍保护发展史》,也屡屡困于“无米做炊”的处境。

何其幸运,上海图书馆藏有三部同名《广装潢志》的稿本,全书荦荦十万余言,古书字画保护方面的史料极为丰富。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广装潢志》眷清稿,内容实与上图藏本相近。一书存留四稿,此类情形并不多见。若汇聚四稿而观之,《广装潢志》的“生命史”,即其初稿逐步修订成眷清稿的详细经过便得一览无遗。以下先梳理四部稿本的先后顺序,再评介其内容与价值,最后将此书置于学术史的脉络中稍作分析,但愿能为古籍保护发展史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 一、四部稿本的先后顺序

2018年11月,上海图书馆举办了“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主办方对展品中的《广装潢志》青睐有加,盛赞该书“辑历代载记及自身经眼之图书字画装潢资料为一编,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尽的装潢史撰述”<sup>①</sup>。这三部同名著作,行款皆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民国时期“佚名撰”的《广装潢志》眷清稿,凡二百三十五叶,行款与上图藏本一致,内容亦相近。正文端楷抄就,似出抄工之手,复经作者墨笔草书修订,且多眉批<sup>②</sup>。对照字迹数过,可知四部稿本的作者皆为宣哲。

宣哲(1866—1942),原名人哲,字古愚,笔名黄叶翁,晚号愚公<sup>③</sup>。诸生。曾任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辛亥鼎革,宣哲南下,长年寓居上海,与黄宾虹、张元济、陈叔通、高吹万、袁克文、秦更年等沪上名流谈诗论艺。抗战期间,卒于申城。所著《板本考》《扬州金石目》《金石学著述考》《高邮志餘》《中西度量衡考》《古玺字源》等稿本皆藏于上海图书馆。

《广装潢志》的作者身份既已确定,但四部稿本的成书顺序还需考辨—

(接上页)2005年;臧春华:《简论古书中有关古籍修复的记录》,《天一阁文丛》第13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1—167页;王国强:《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万晓:《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专门围绕古籍修复技艺的发展与演变脉络而撰写的通史,暂付阙如。

①上海图书馆编:《缥缃流彩——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②此稿近年方有影印本,详参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74—643页。

③张宗儒:《宣愚公先生传》,《泉币》1943年第18期,第22—23页。

番。上图所藏三部稿本，分装三册，皆为毛装草钉，书号相连（826093-95）。第一册外封题“广装潢志”，第二册题“广装潢志副本”，第三册题“广装潢志新定本”（以下简称“稿本”“副本”“新定本”）。这些佚名题字，让读者容易产生错觉，仿佛三部稿本的成书顺序是“稿本”在先，再录“副本”，最后方有“新定本”。三者针对同一内容的表述略有差异，结合墨笔修改痕迹，可知正确的文本传承关系并非如此。

成书最早的是“副本”。因为他本卷首皆有目录，其次为第一节《释名》篇，第二节则为《类别》篇，而“副本”的正文一开始便是《类别》篇，缺《释名》篇。此类缺损，极可能是因为“副本”原先置于首册，在流传过程中，头几叶容易损坏丢失<sup>①</sup>。校勘数过，证实这一推断基本可靠。试以《类别》篇开头的文字为例，“副本”作：

装潢之物，大略分三类，曰卷、曰轴、曰册。

卷之兴，其始于汉乎？自方策既废，代以纸素，于是韦编之法不复适用，而卷子以兴。班氏《汉书·艺文志》篇卷并列，疑当时延阁广内秘室所藏，尚多周秦篇籍。班氏称孝武世书缺简脱，颜师古注谓编绝散落故简脱，是其证也。惟其书经汉之写官重录者，始为卷耳。李唐以前，雕印之术未□，故经籍无一非卷子本，然非法书名画，往往不事装饰。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云：“夏英公家有皂绫标《唐六典》，唐旧本也。”

法仅见此。今所见敦煌石室故书，但以黏物涂而续之。虽白麻纸之  
极薄者，亦未见有装裱之制，纸末俱轴而已。绍兴御府临书六朝、羲、献、唐人法帖，并杂诗赋等。内长篇不用边道，衣古厚纸，不揭不背，虽法书亦不装，斯亦简便之最矣。

引文中带有外框的文字，表示原稿所无而墨笔添入者；□则表示原稿字迹不清，无法识别者。“副本”此段文字的天头还有眉批，作者补抄了两则材料，分别出自窦臮《述书赋注》与柳宗元诗。再对比“新定本”《类别》篇的相应内容，沿袭痕迹一目了然：

装潢之物，约分三类，曰卷、曰轴、曰册。

卷之兴，其始于汉乎？方策既废，代以纸素，于是韦编之法不复适用，而卷子以兴。班氏《汉书·艺文志》篇卷并列，疑当时延阁广内秘室所藏，尚多周秦篇籍。班氏称孝武世书缺简脱，颜师古注谓编绝散落故简脱，是其证也。惟其书经汉之写官重录者，始为卷耳。汉人自著，则

<sup>①</sup>由于上海图书馆只允许阅览《广装潢志》的电子扫描件，笔者未见原书，所以这里也不能完全排除馆方漏扫若干书叶的可能。

亦不复用简策。李唐以前，雕印之术未传遍于世，故经籍无一非卷子本，然非法书名画，往往不事装饰。窦臮《述书赋注》称皇象写《春秋·哀公上》第二十九卷，其纸每一大幅，有一缝线联合之。杜元凯押尾云：“此是茧纸，纸紧薄有脉，似桦皮，以诸茧此类，殊有异者也。”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云：“夏英公家有皂绫标《唐六典》，唐旧本也。”法仅见此。今所见敦煌石室故书，但以黏物涂而续之。虽白麻纸之极薄者，亦未见有装褫之制。纸末俱轴而已。柳子厚诗云：“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老手自题。”注云：“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右军六纸。”见任渊《后山诗注》三。绍兴御府临书六朝羲献唐人法帖，并杂诗赋等。内长篇不用边道，衣古厚纸，不揭不背，虽法书亦不装，斯亦简俭之最矣。

不难发现，“副本”墨笔添补的文字，“新定本”全部誊录到正文中去。而且“副本”两则眉批的资料，即窦臮《述书赋注》与柳宗元诗，也被作者安插到正文中合适的位置。据此可知，“新定本”乃据“副本”修改而来，宣哲另于“始为卷耳”后，增补“汉人自著”一句。总体来看，“新定本”只是略加增补，修订幅度不及“稿本”。“稿本”之《类别》篇云：

装潢之物书画，不外三类，卷、轴、册是也。卷之兴，其始于汉乎？方册既废，代以纸素，于是韦编之法，不复适手用，而装潢之事以起。班氏《汉书·艺文志》篇卷并列，疑当时延阁广内秘室所藏，尚多周秦旧籍。班氏称孝武世书缺简脱，颜师古注谓编绝散落故简脱，是其证也。惟其书经汉之写官重录者，始为卷耳。汉人所自著，亦断不复用简策，然皆书迹也。及杂出图谱，始有画卷，大抵羽翼经传，非供玩好。后世以其年远而技精，乃宝藏之。至于六朝，始有集法书装以为玩物矣，轴以代壁书壁画屏风者也。六朝以来，传画轴不传书轴，然唐宋画壁犹不废。明以后萧云从之画○○○○○○○○各由于○○○楼特偶然为之。近时朱龄画松，四堵社南清河松荫庵中，余少时犹见之。壁画甚大，故画轴亦古大而今小，至宋始有书轴传于世。册最后起，殆摹梵夹为之，后亦莫能之废也。贝叶经裁□带继方式中横列三孔，以绳贯之。唐人写经，犹多卷子本，梵夹异始于宋人刻版以后也。今分著其相因及损益之迹焉。

需要说明的是，“稿本”首句原作“卷、轴、册”，经墨笔乙正作“卷、册、轴”。○表示原稿之空字，加中横线的文字乃墨笔勾删者。“然皆书迹也”直至“今分著其相因及损益之迹焉”这一大段话，“副本”及“新定本”皆无。经此增补，稿本此段的篇幅大大超过“副本”与“新定本”，于是作者不得不将

“李唐以前”直至“斯亦简俭之最矣”的文字另起一段，文长不录。

至于南京图书馆所藏眷清稿，与上图三部稿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分卷。眷清稿将二十节的文字分成六卷（详见后文），例如《释名》《类别》《释物》三篇，归并为卷一。至于文本内容方面，眷清稿更加完善。仍以《类别》篇为例，眷清稿作：

装潢书画，不外三类。卷、册、轴是也。班氏《汉书·艺文志》篇卷并列，疑当时延阁广内秘室所藏，尚多周秦旧籍。班氏称孝武世书缺简脱，颜师古注谓编绝散落故简脱，是其证也。惟其书经汉之写官重录者，始为卷耳。汉人所自著，亦断不复用简策，然皆书迹也。及杂出图谱，始有画卷，大抵羽翼经传，非供玩好。后世以其年远而技精，乃宝藏之。至于六朝，始有集法书装以为玩者矣。轴装不唯代简策，且以代壁书壁画及屏风矣。然六朝以来，传画轴不传书轴。唐宋虽有画幅，画壁犹不废。壁画甚大，故画轴亦古大而今小。至宋始有书轴传于世。册最后起，殆摹梵夹为之，今分著其相因及损益之迹焉。<sup>①</sup>

前揭“稿本”的修订意见，被眷清稿悉数采纳，足以证明后者正是根据“稿本”眷录而来。不唯《类别》篇，比勘其他篇目，也可验证四稿之前后次第。首“副本”，次“新定本”，再次“稿本”，终至眷清稿，方为正确顺序。最接近定本状态的眷清稿，犹存多处增删涂乙。宣哲为《广装潢志》倾注心血，赍志而歿，著书之难如此。将来倘有好事者整理其书以广流传，自当取眷清稿作底本，并揭示最后增补修订的内容。但学界目前对《广装潢志》还不甚了解，故其内容仍有必要评介，其价值也应该得到表彰。

## 二、《广装潢志》的内容与价值

眷清稿《广装潢志》分为六卷。卷一所收为《释名》《类别》《释物》，三篇皆针对古代装潢方面的常用语进行辨析。“装”“潢”“表”“背”原义不一，又衍生出“装潢”“装褫”“装治”等语，“文人随事立名，执此业者，或不知所取义”，《释名》篇便对这些用语“汇而释之”。装帧形制可归为卷、册、轴三大类。若再细分，卷子类“有长卷、短卷之别，有高卷、矮卷之别”；册子类有册页、褶襟、推蓬等，轴类有堂幅、润幅、横幅、双幅等。《类别》篇介绍了不同类型的装帧形制术语。装潢所用的配件不胜枚举，读者欲知襟、包首、引首、隔水、玉池、拖尾、惊燕、副叶诸物“命名之义”或源流，可参看《释物》篇。

第二卷基本上以人为纲。《巧工》篇罗列了八十四位装潢工，始于贞观

<sup>①</sup>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189—190页。

年间的樊行整，终于清末朱倬。装工之外，雅好装潢的文人事迹则编入《游艺》篇。“唐以前御府装潢物，装工或不尽题名卷尾，而监装诸臣，必一一押署姓名。”<sup>①</sup>“私家藏古”亦然，作者综录此类资料成《监装》篇。装池之际，需要区分真伪，排定先后。但是“同时所制，或有雅俗之分，一人之迹，亦有乖合之异”，有鉴于此，装潢“别美恶”或“叙先后”至关重要，此为《诠次》篇的主旨。此篇对监装者提出“精于鉴赏，且洞识物情”的要求，但其焦点已从人物过渡到式样，故当与下卷《定式》《别裁》两篇合观。

卷三前半部分为《定式》《别裁》二篇。《定式》汇录宋元明三代装褫书画定式，以见当时风尚。装潢之式，宣哲谓：“十年而一变，边之狭与阔也，绫与绢之代兴也，染色之深与浅也，织物之有花文者，花文之大小也。其变也，非鉴赏家提倡之，俗工操纵之耳。”<sup>②</sup>于是，宣哲择取独特另类的装潢手法，如立幅装横卷、百衲装、表里装、微空一线装法等等，构成《别裁》篇。卷三的后半部分是《金石》《经籍》两篇专题资料研究，依次收揽金石拓片与藏书目录题跋所记装潢资料。

卷四首《储材》篇，次《利器》篇，分别汇录装潢材料（造纸、织绫、绢锦、蔚丝、刺绣、髹漆等）与装潢工具（界尺、裁板、擂槌）方面的史料。宣哲认为，装潢虽为技艺，然而如何把握时间、选择材料、运用工具、施展技艺，皆有“之所以然”的学理，故编写《学术》篇“刺诸书及此者，以附益周氏旧说制糊之法”。

卷五之首为《庇谬》篇，分批展示前人失察或作伪而导致的“误合两文为一”“文字失原次”“旁注装入行内”“裁损印迹”“剪损跋尾”各类纰误。《述古》篇专述历朝内府装潢书画、古籍之制。《故事》篇则将“艺事之分职，所司之支给，以及敕治之件，管司之官”汇而录之。前文所举种种，足以呈现我国装潢事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面相，唯独忽略了地域性差异，卷六《地良》篇适可补此空白。装潢完毕，藏家或题志年月，或题签钤印。至于安装储放，更是“牌以别之，帙以裹之，袋以盛之，匣以藏之”，《馀事》篇所收便是这方面的史料。其他与装潢相关的掌故，一并归入卷末《杂录》篇。

《广装潢志》囊括了海量的古书字画修复装潢方面的材料，这是它的最大价值。逐一摘出眷清稿所引之书，按四部分类排序，足以显示宣哲用功之精勤与学问之广博。经部书仅有《周礼·考工记》《释名》两种。史部目录类有《隋书·经籍志》等三十三种，地理类有《[至顺]镇江志》等七种。史部其他书有《南史》《唐书》《唐六典》《十国春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郭天锡

①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309页。

②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339页。

日记》《缘督庐日记》等。比重最大的是子部艺术类,年代上至唐代窦臮《述书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下至清末民国叶德辉的《游艺卮言》,共八十七种。子部杂家类以笔记居多,凡五十八种。最后是别集类,有《宛陵集》等四十九种。总集类有《中州集》至《近代诗钞》七种。

通计之,眷清稿《广装潢志》引书二百五十种,其中确有稀见资料。如《释名》篇引王炎午《吾汶稿·赠晏裱褙》便很珍贵。王炎午说:“装之事又有二,表与背是也。裁饰其外之谓表,辅观其里之谓背。”<sup>①</sup>今人辨析装潢名词,认为“背”或“褙”是指在画心背面上托纸进行加工;“裱”是用纸或丝织品等软质材料相粘结,侧重于加厚加固<sup>②</sup>。相较之下,未及宋人原话切中肯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宣哲没有迷失于史料之林,而是驾驭有方,使得全书清晰可观。卷一《释名》篇便很好地展示其剪裁之力:

或又易称“裁潢”。见安世凤《墨林快事》(详《游艺》篇)。

其事无异也。“表”又通“襍”。庞元英《文昌杂录》称帛綉裱襍《唐六典》(详《类别》篇)。

凡装之事以纸,若绫绢等,护其边,谓之“相滚”,亦俗称。见《秘书监志》(详《巧工》篇)。<sup>③</sup>

如此布局,各篇之间贯通互见,前后照应。又如《经籍》篇已述历朝官书之制,“艺事之分职,所司之支给,以及敕治之件,管司之官”则别详《述古》篇中。此详则彼略,同时保证两者篇幅不至于悬殊。各章节体例严明,又互相勾连,浑然一体。

格式方面,宣哲自己的话顶格书写,引他人语则次行低一格书写。对史料的考证则以双行小字夹注其中,如《储材》篇引《辍耕录》,小字按语云:“翠色狮子一种,疑即《春明退朝录》之‘翠毛狮子’,其下‘盘球’二字,当连上读为一种,或与宋氏所记者有别,故复列于目也。”<sup>④</sup>《巧工》篇“邵周”条则记下他的质疑:“叶梦龙《风满楼书画录》载唐薛稷书《陈思王七启卷》云:‘升元四年四月十日文房付使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臣邵周重装。’”小字注云:“按狄平子影印真迹作‘二月’,未知孰为赝本。”<sup>⑤</sup>

散见四处的按语中不乏散金碎玉。《释名》篇云:“宋以前装书画与装经

①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180页。

②张恨无:《中国书画装潢艺术》,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③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183—184页。

④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409页。

⑤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32页。

籍者，本不分工也。”<sup>①</sup>这是我国书册制度史上颇为重要的论断。或许还可追问，何以宋代字画与书籍的装潢出现分工？又如《述古》篇：“著录家侈称宣和旧装，碑帖较多，书画则仅有焉。蠹馀浆脱，安知未经后人加糊重治者。”<sup>②</sup>这个反问颇有力量，也启发我们重视古籍的原装与重装问题。类似“龙鳞装”“旋风装”这类“妾身未明”的装帧，必须在确保实物证据未经后世重装的前提下展来论证，方才有效。宣哲又说：“良工之事其事也，巧思以图艰，妙腕以赴的。日月验之，然后能自得师。及其艺既工，以授弟子，往往不能尽其术。非吝也，心所欲宣，梗之于口，更何论著书，以贻后世，可哀也矣。唐以来士夫之好事者，矜鉴藏、习潢治，或并身执其劳，或只心通其故。凡所举正，固非俗工所能道其万一，时何以宜，材何以选，器何以利，技何以良，皆有其术在，不学可乎？”<sup>③</sup>这番话出自《学术》篇，尤其值得古籍修复专业的青年才俊深思。

### 三、学术史脉络中的《广装潢志》

最后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宣哲《广装潢志》接续的两个传统，考察其撰述背景及后续影响。

《广装潢志》接续了明中叶以降文人撰述书画装潢技艺的传统。周嘉胄《装潢志》是我国第一部装裱修复专书。其后，雅好清玩的文人墨客在书画题跋目录与笔记中，对装潢技艺屡有记述。宣哲将这类“增广见闻”性质的零碎资料联属排比，汇成一书并命之为《广装潢志》，显然意在接续周书而踵事增华。周书全文被吸纳入《学术》篇，便是力证。但《广装潢志》之“广”，不仅体现在扩充史料体量，保存艺苑风雅，更重要的是作者具备了现代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上节所示《广装潢志》六卷目录之编次，反映了宣哲分专题进行研究的努力，而各项专题贯通起来形成了统一的旨趣：尽可能全面地总结古代装潢史。故而《广装潢志》的系统性与条理性，远非周书可比。从体裁上衡量，《广装潢志》的撰述形式已摆脱传统题跋笔记的窠臼，过渡至现代学术著作。毋庸讳言，书中不少地方只有片段式的感性表述，缺乏严密论证，未能深入地讨论问题。而且宣哲长于搜辑史料，短于分析阐释。但是，从学术史的脉络回溯范式转移酿成的客观事实，现代意义上的装潢史研究开山之作，不得不推《广装潢志》。

《广装潢志》接续的第二个传统，即清代中叶经生对书册制度的考证。

①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187页。

②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505页。

③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441页。

嘉庆四年(1799),浙抚阮元设“诂经精舍”,鸠集学人校勘《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主事者为段玉裁。定稿的过程中,清儒遇到古代书册制度的问题产生争论,汪继培、徐养原、金鹗诸生纷纷撰文讨论书册制度,便是缘此而起<sup>①</sup>。但他们的考证停留于文献记载层面,未据实物。清末以来,殷墟甲骨、敦煌简牍写卷、内阁大库书档的发现,为书册制度研究提供了原装的实物材料。王国维、马衡、王重民、余嘉锡诸公,上承乾嘉考据之餘绪,又结合新材料以预流<sup>②</sup>。民国时期考述书册制度演变的文章层出不穷,宣哲编撰《广装潢志》并反复修改,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至于他何时开始撰写《广装潢志》,尚无线索。目前仅知民国十年(1921),北京的《忧乐杂志》分三期连载《广装潢志·巧工篇》,作者署名“愚公”<sup>③</sup>。那么,《广装潢志》不迟于民国十年已初具雏形,且《巧工篇》的发表时间早于马衡、王重民、余嘉锡诸文。可惜《忧乐杂志》发行五期即停刊,流通范围不广。

虽然宣哲及其友朋皆非学界要人,但他对书籍装帧研究动态相当熟稔。《余事》篇摘录了日本书志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考证书册装潢制度的文字。岛田之书传入中国,最早的本子是民国十六年(1927)藻玉堂铅印本。宣统初奏请清理内阁大库,所出宋刻《文苑英华》残本是难得一见的蝴蝶装原装实物,《广装潢志》眷清稿也留意及此。《监装》篇引罗振玉《辽居稿·宋椠〈文苑英华〉残本校记跋》云:“乙巳正月,见内库宋椠残本一册,存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卷,书衣末有‘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迄’墨戳。”<sup>④</sup>罗振玉《辽居稿》最早的本子是民国十八年(1929)石印本。可见宣哲及时参阅了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将其补入眷清稿中。

由于宣哲“闭门著书,不求闻达”,《广装潢志》除《巧工篇》外的其他章节未曾公布,所以其人其书湮没无闻<sup>⑤</sup>。建国以后,该书渐渐少有人知。1986年,潘景郑发表《历代装潢工人考略》,全文居然与《广装潢志》眷清稿

①例如汪继培《周代书册制度考》、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载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清嘉庆间阮氏琅嬛仙馆刻本,第28—38页。

②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中文稿首刊于1914年《云窗丛刊》,转引自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1页。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2期,第199—213页。王重民:《说装潢》,《图书馆季刊》1931年第5卷1期,第39—41页。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1935年,第29—47页。

③北京忧乐杂志社编:《忧乐杂志》,1921年第3至5期,版心无页码。

④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317—318页。

⑤范君博:《书宣古愚》,《万象》1943年第2卷第11期,第167—168页。

的《巧工》篇雷同<sup>①</sup>。具体的比较如下：

第一，潘文与眷清稿《巧工》篇所收装潢工人的具体条目多有重合，所重合者排序基本一致。经清点，潘文共分八十条，罗列了九十四位装潢工；眷清稿《巧工》篇的正文分作七十一条，罗列了八十四位装潢工。除了“翁匠”与“孙凤”两条外，眷清稿的八十二位装潢工资料皆收入潘文，排序相同。稍异者只有眷清稿第四十七条“庄希叔”，潘文拆成“庄希叔、顾元方”二人。

第二，眷清稿眉批、卷末所补装潢工资料，潘文全部纳入正文。例如眷清稿“胡贸”条之上，眉批补录“汤翰”资料：“《式古堂书画汇考》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下载王世懋跋云：‘朱太保绝重此卷，延吴人汤翰装池。’”<sup>②</sup>潘文将这段文字径补入正文“汤翰”条。

又如，眷清稿在“张玉瑞”与“秦长年”两条之间，有眉批云：“‘徐翁’误系《游艺》十‘汪士鋐’后，当移此。”<sup>③</sup>检此稿《游艺》篇“汪士鋐”条，天头增补了一段“徐翁”的材料，出自清梁同书《频罗庵书画跋》。作者将这一段文字圈画出来，并标识云：“当移入《巧工》十九‘张玉瑞’，此误刊。”<sup>④</sup>潘文适将圈画出来的文字列在“张玉瑞”后，这样布局显然是吸收了眷清稿眉批的意见。另外，眷清稿《巧工》篇卷末增补了王辰、何格之、陈朴之三位装潢工。潘文也将其安插入正文，列于“施堂”与“萧飞卿”之间。

第三，眷清稿正文修订之迹、增补之文，皆为潘文所取。如《巧工》篇“赵孟林”条，有一段文字原作：“游景仁藏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又游景仁藏宋拓褚摹兰亭米跋卷，又宋拓兰亭卷，均宋拓裱，各有白文‘赵氏孟林’印。”墨笔将此修改作：“游景仁藏开皇兰亭宋御府拓定武褚临兰亭米跋卷，宋拓刘贵妃并内侍张延礼兰亭合卷，宋拓兰亭临江王摹本，各有白文‘赵氏孟林’印。”<sup>⑤</sup>潘文“赵孟林”条相应文字，正同墨笔所改。又如眷清稿《巧工》篇“顾勤”条，节抄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题装潢顾生勤卷》诗：“梅边亭子竹边风，添种梁园一捻红。不独装池称绝艺，画图兼似虎头工。”此诗不完，故作者墨笔补录后半部分：“过眼云烟记未曾，香厨争借理签胜。残山胜水成完幅，想像张龙树不能。”<sup>⑥</sup>潘文“顾勤”条录有全诗。

第四，眷清稿引书偶有删润，潘文所引之节略情况亦同。例如“庄希叔”

①潘景郑：《历代装潢工人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第322—329页。

②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51页。

③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63页。

④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92页。

⑤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35页。

⑥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62页。

条，眷清稿引《装潢志》云：“吴人庄希叔侨寓白门，以装潢擅名，其人慷慨慕义，诚笃尚友，士绅乐与之游，咸为推挽之。然以技自讳，不妄徇俗，间应知己之情。谬赏余为知鉴，所祈弗吝。往余之吴门，携希叔之制，示诸装潢家，希其仿佛教为之，皆啧啧钦服，谓非希叔不能也。”<sup>①</sup>检周嘉胄《装潢志》原文，可知引文删去了“颤颤汤、强，一时称绝”，以及“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续为《黄鹤》之题乎”两句话。潘文也是如此节引。

第五，潘文承袭了眷清稿的讹误。眷清稿引“高氏《志》”，书名当作“周氏《志》”，即周嘉胄《装潢志》。潘文相应文字皆沿其误。综上例证，应该说眷清稿《巧工》篇就是潘景郑《历代装潢工人考略》的直接来源。潘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会装潢古书碑帖。这样身份的文献学家径直采用《广装潢志》，诚然是慧眼识珠，但也显示出宣哲其人其书长期湮没无闻，有待深入挖掘。

时至今日，了解当代不同专业学者的问题意识与相关论断之后，再读《广装潢志》也会有新的发现。艺术史专家巫鸿探讨了“游”的观念与手卷画的关系，认为“手卷最早也最清晰地体现出了‘游’和绘画媒材的关系”<sup>②</sup>。检《广装潢志》，《类别》篇云：“卷宜于藏，宜于读，昔人好改册为卷，每一展阅，其全卷皆不免劳茹，谓改装为卷，始足以宝护名迹。吾不知其可也，然携以出游则便矣。”<sup>③</sup>今天看来，宣哲可谓孤明先发，点出了不同装潢形制所对应的实用功能。土人游宦，或将赏心悦目的书画携之行箧。手卷的物理形态不惟舟车便览，同时要求独特的赏阅方式。舟车行进，画中的风景被持卧于行人手中，一次一小段地缓缓移动。明乎此，方能合理地解释行旅题材的书画为何多数采用手卷装裱，又如何实现文化内涵与实用功能的完美融合。

装帧形制的发展变化离不开物质技术条件的推动或制约，也与古籍保护理念息息相关。仍以卷子本为例，敦煌遗书研究专家林世田有过分析：“为保护正文不被磨损，正文前粘接一张白纸，也有粘接绢、绫等丝织品的，是为‘标’、‘包首’。为保护卷首，在包首前加装一根细竹条或木条，竹木条中间系一丝带，以便捆扎卷子，此为‘带’。”<sup>④</sup>这一论断很有道理，若能引据唐

①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257—258页。

②巫鸿：《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3页。

③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194页。

④林世田：《书籍保护：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演变的源泉和动力》，张志清、陈红彦主编：《古籍保护新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6—283页。

以前的文献记载作为辅证，就更有说服力。《广装潢志》的《学术》篇节引《齐民要术》谓：“凡开卷读书，卷头首纸不宜急卷，急则破折，折则裂。以书带上下络首纸者，无不裂坏。”<sup>①</sup>《齐民要术》原书此后又谓：“卷一两张后，乃以书带上下络之者，稳而不坏。”<sup>②</sup>北魏贾思勰仅云“卷一两张后”，可见“包首”确实如宣哲所提醒，属于“晚出之名”，不宜混用。装潢称谓、术语的时代差异，背后隐含着古籍保护技术与理念的发展变化。本文开头呼吁，吾辈应当构建一部中国古籍保护发展史，念兹在兹的正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照此细察，起保护作用的“一两张纸”，对于手卷而言是“包首”，不过对于方册形制的书籍来说，已经变成“护叶”或“副叶”。称谓的变化，涉及物质文化史的一大关键，即书籍与字画的分合问题。六朝时期是卷子本的时代，“图书”本为一体，其装潢亦如宣哲所言：“宋以前装书画与装经籍者，本不分工也。”<sup>③</sup>但是唐宋以后的书籍，陆续经历了从卷轴装到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演变。方册渐渐成为书籍装帧——尤其是刻本的主流形制，人们对书籍与图画的观念不能无别。从古籍保护的角度，讨论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之馀，还应深入到不同材料（帛、绢、纸等）与构件（护叶、纸钉等）的演变关系，进而比较书籍与字画装潢艺术的共性与差异。

若将《广装潢志》的展览以及影印出版，称为近年来古籍保护工作的一大创获，应非漫许。因为古籍保护发展史的研究，在过去一直难寻依傍，甚为艰苦。现在《广装潢志》的“再生”，贡献了充足的史料作为后盾。书中夹杂的一些论断洞中窾要，启人深思，或许可以发掘出更多研究议题。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我们深深感恩这一笔丰厚的馈赠，显然也应该充分利用它，将古籍保护研究推向无愧前贤的新境地。

匿审专家与中山大学史洪权老师等提出修订意见，拙文多有采纳，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陈腾，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

①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442页。

②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③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子部》第21册，第187页。



图1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广装潢志》卷一《释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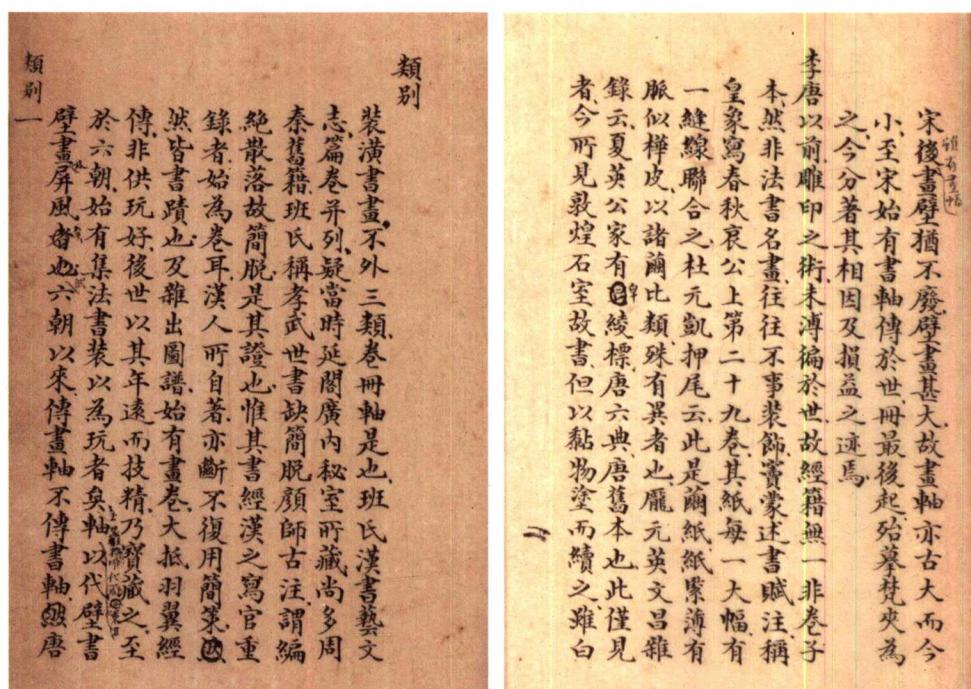


图2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广装潢志》卷一《类别》篇

详参陈腾《〈广装潢志〉的四部稿本》一文